

中國古代瓷器上的外來文化因素

王光堯（故宮博物院 北京）

瓷器是中國先民對世界文明最偉大的貢獻內容之一，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

考古發現已知最早的原始青瓷窯址是福建永春苦寨坑窯址，約當于夏代晚期，至少有 3600 年以上的歷史。瓷器雖然蘊涵著濃厚的中國文化基因，但是始終保持著開放包容的態度，中國先民不僅允許自己獨有的瓷器運銷域外，而且不停地把外來文化因素用於瓷器生產之中，實現美美與共，瓷器因此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載體，世界學術界所說的“陶瓷之路”，正是對古代以瓷器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盛況的高度提煉。

瓷器外銷，始於南北朝時期，當時中國南方生產的瓷器已經被輸往朝鮮半島，瓷器開始具有國際性的意義和市場。到唐五代時期，長沙窯、邢窯、越窯等窯場生產的瓷器已經流布東亞、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北非、東非，極少數瓷器已進入歐洲，當時凡航行可覆蓋的區域基本上都有了中國瓷器的身影。當時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已經能區分中國皇帝使用的瓷器和一般瓷器的區別，印尼黑石號沉船出水的“盈”字款和“進奉”款白釉綠彩瓷器、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官”字定窯白瓷，正是對波斯文獻所說巴格達的哈裡發能得到中國皇帝使用的瓷器的考古學注解。開闢新航路的原始目的是歐洲人想躲開地中海、黑海、裡海和紅海航線尋找新的可以通往亞洲的航線、以便獲得東方精美的物品，中國生產的絲綢和瓷器均為他們要獲得的內容。藉由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中國瓷器得以

流布世界各地，並帶動世界青花瓷器時代的出現，澳門在此時中國瓷器外銷的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北灣遺存出土的瓷器就是當時經由澳門的海船在此轉裝的遺留。

文化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外來文化影響中國陶瓷歷史也久。僅就陶瓷器論，具有矽酸鹽性質的蜻蜓眼玻璃珠入華的時間早於春秋時期，約在漢代來自波斯的孔雀藍釉陶器已經出現在桂林地區。在中國瓷器向外輸出的同時，外來文化因素也多次被用於陶瓷器生產，構成中國瓷器的內容。這一行為的最初目的無疑是讓中國生產的瓷器更加美好，更有利於豐富和美化中國人自己的生活，但隨著海外瓷器市場日益重要，把外來文化因素表現到瓷器上也有了適應市場需要的意圖、有了讓中國以外的人與瓷器容易產生親近感的目的，從而讓他們更加樂意接受中國瓷器，以促成中國瓷器在世界市場的持續擴大。

表現在中國陶瓷器上的外來文化因素，當首推在漢代經由印度傳入中國的琉璃，彼時琉璃是作為佛家七寶之一進入中國。這種技術在漢代迅速和中國傳統的陶器生產技術結合，以低溫鉛釉和滿釉支釘支燒為特點，生產出了尊、壺、鈐、瓢、直頸瓶等日用器，狗豬雞等動物形雕塑，和以建築模型為代表的冥器，從生產技術和釉色品種方面豐富了中國陶器的內容，低溫鉛釉從此成為中國陶瓷器生產的重要門類之一（圖 1）。六朝時期，來自域外的佛像、獅子以及與佛教相關的紋樣成為瓷上裝飾內容，中國瓷器第一次通過裝飾紋樣表現出了國際化的特點（圖 2）。約略在同一個時期的北方，也從西亞、中亞地區學得了低溫的鉛釉技術，文獻記載北魏太武帝時大月氏商人在平城燒造琉璃並用於宮殿建設，讓中國的琉璃生產技術得以恢復，鄴城曹村窯址發現的低溫釉器物和以婁睿墓、李雲墓、麴慶墓等墓出土的北朝晚期到隋初的低溫彩釉器物，正可以視為是大月氏人來華

重構琉璃生產的物證（圖 3）。文獻所說隋唐之際何稠以綠瓷為琉璃，明確把外來的這種鉛釉技術和中國傳統的瓷器生產相結合，不僅擴大了琉璃生產的基礎，也為琉璃廣泛用於宮殿建築提供了可能。北朝隋唐時期北方瓷器無論是器物造型、裝飾內容多學習玻璃器和金銀器，並成為時尚。唐代的珍珠地裝飾極有可能是學習金銀器鑿花工藝與表現藝術的結果，絞胎和絞釉器的出現與外來的羅馬絞胎玻璃之間的關係同樣也值得關注。在唐代，不僅有薩珊波斯貴族流亡中國，大量粟特人循絲路來華生活更是從經濟、文化和軍事諸層都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影響，以反動和破壞為特點的安史之亂，就是粟特人給中國帶來影響的最大表現。隨著海上交通的便利，來華的波斯和阿拉伯人劇增，不僅在器物類別、造型、紋樣上給中國陶瓷器生產輸入了新的活力，他們帶的青花鈷料也促成了三彩器物顏色的多樣和唐青花的出現，同時鞏縣窯瓷器上用青花繪製的、山西南部地區窯場白釉瓷器上流行的暗刻阿拉伯圖案開始流行，從這類器物的生產地在洛陽周邊地區看，其產品服務物件應該是以洛陽的上層社會為中心。

在經濟壓力下南宋王朝鼓勵對外貿易，瓷器和絲綢成為大宗輸出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對海外市場的關注，導致南宋時期的瓷器生產呈現著以下特點：第一是在福建、廣東、廣西地區出現了模仿內地名窯場產品的窯場，其生產目的多以海外為市場；第二是在生產之初無論是器物類別還造型和紋樣，開始有意識地思考海外市場的需求；第三是當時的知識界和政府層面已開始關注和收集海外各地區對中國瓷器和絲綢等商品的需求差異和關注程度。元朝建立後不僅沿襲宋代舊法鼓勵外貿，甚至採用官本船即實行官府出資招募私人下海貿易的股份制外貿模式，再加上蒙古人在歐亞地區建立了規模空前的帝國，東西方的交流和文化互動也同樣空前便利，中國瓷器迎來了向外輸出的最高峰時期，這一波瓷器大規模

的輸出一直持續到鄭和下西洋活動被停止。該時期表現在中國瓷器的外來文化因素和青花相關，一方面是來自西亞的客匠把產自波斯地區的青花鈷料和景德鎮的青白器對接生產出了青花瓷器，另一方面南亞、西亞地區流行的紋樣和器類、器型成為明代早期瓷器的時尚並大量銷往東南亞、南亞、西亞和非洲地區。可以肯定說青花瓷的出現是中國與西亞技術、文化結合的完美表現（圖 4；圖 5）。明代檔案記載的回回花紋從永樂宣德時期一直流行到萬曆時期，也反證唐代瓷器上的同類紋樣同樣是為了服務于西亞市場，是中國瓷器在生產始端已考慮海外市場、自覺融入全球經濟鏈條的表現。

明代晚期，“回青”原料從雲南再度傳入內地並用於瓷器生產，中國瓷器被運銷到世界各地，同時以來樣加工為模式的瓷器生產和克拉克風格瓷器盛行，包括歐洲人流行的家族徽章見於瓷器，是大航海後原料供應全球化和商品生產與市場全球化的表現。澳門作為東方地區開埠最早的國際性港口在這一全球化過程的作用永遠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延續明代晚期瓷器生產原料和市場的全球化，清代瓷器生產同樣表現著強勁的開放性勢頭，一方面是從和日本的競爭、學習中又奪回了歐洲市場，表現在瓷器上不僅是器物造型、類別要思考歐洲市場的需求，在紋樣繪製方面當時在歐洲產生過影響的浮世繪也在康熙時期的外銷瓷器上有所表現，而以克拉克瓷器開光圖案為特點的圖案構成方法也影響了內地市場的瓷器。根據唐英奏摺記載到乾隆時期禦窯廠生產的五十多種釉色品種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技術直接來自歐洲或日本，這包括我們習知的珐瑯彩、粉彩、金彩、像生瓷等，徹底改變了清代彩瓷的走向（圖 6；圖 7；圖 8）。及至晚清，機器生產技術和現代商業模式的引入，瓷業公司在各地出現，景德鎮禦窯廠也以官股的形式在光緒末年加入商辦江西瓷業公司，在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不僅有管廠官員林世祺進

呈的用機器製成的樣瓷，而署“大清宣統年制”款的各種御用瓷器同樣也可以肯定是瓷業公司的作品。綜觀明代晚期以來中國瓷器生產的這種變化，既可以說是中國人在接觸和瞭解到更遙遠的世界後對外來文化包容接納的表現，也是具有三千年生產歷史的中國瓷器走向現代化、工業化生產的開始，是中國文明連續性和包容性在瓷器身上的生動表現。



(圖 1)

東漢 綠釉刻弦紋鋪首陶壺
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北朝 綠釉凸花人物紋雙耳扁壺
故宮博物院藏



(圖 3)

北朝 黃釉綠彩劃花四系罐
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明永樂 青花纏枝花紋魚簍尊
故宮博物院藏



(圖 5)

明宣德 青花纏枝蓮紋花澆
故宮博物院藏



© 故宮博物院 | MUSEU DO PALÁCIO | THE PALACE MUSEUM

(圖 6) “海通鏡鑒” 展品之一
清康熙 胭脂紫地琺瑯彩折枝蓮紋瓶
故宮博物院藏



(圖 7)

清雍正 琺瑯彩黃地蘭石紋碗
故宮博物院藏



(圖 8) “海通鏡鑒” 展品之一
清乾隆 琺瑯彩仕女圖方盒
故宮博物院藏